

# 提升我国全球供应链竞争新优势

□ 张成

## 调查研究

近年来,受保护主义、技术变革、要素成本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格局正在加速调整。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加速演进,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在此背景下,准确研判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竞争优势的演化方向,并采取有力举措不断夯实和提升竞争的优势地位,是需要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 准确研判竞争优势演化方向

从中长期看,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中能否获得优势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具备完善的产业体系、高效的生产能力、广阔的市场空间、优良的制度环境等要素和条件。当前,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难以被替代。具体来看,我国产业规模大,2001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逐步升高,在2018年达到23.5%;配套体系全,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这种由高度专业化分工和大规模协作形成的供应链具有较强的韧性;市场规模大,市场潜力足,消费潜力大,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巨国效应”;制度环境优,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逐步形成,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的位次迅速提升,对全球企业形成了较大的吸引力。这些都将促进全球企业与我国开展更深更广的供应链合作,也决定了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供应链正在加速重构,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由“低成本”优势转变为“高性价比”优势。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渐弱化,但同时要看到,我国在劳动生产率、供应链效率和营商环境等方面“高性价比”优势日益凸显。据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测算,2018年,中国劳动生产率达到13700美元/人,年均增速

(2009年至2018年)达到7.7%,高于全球平均增速(1.36%)6.34个百分点。同时,我国供应链效率亦位居同等收入水平(中等偏高收入)国家首位。还要看到,我国营商环境排名明显提升。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一。劳动生产率和供应链效率提升、营商环境逐步优化等,都是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因素。未来,我国的“高性价比”优势将对全球供应链形成较强吸引力。

由规模体量优势转变为创新应用优势。我国以往依靠大规模组装、低价格竞争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这一态势已经随着成本优势的弱化而表现出动力不足,但同时要看到,我国发展空间大、应用场景多、创新应用强的优势日益凸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先进技术市场应用和产业转化的重要地区,国内市场纵深广、层次多以及消费者需求多元等特点,能够给予产业生存发展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市场资源的充分供给,将促使更多企业加速集聚。与此同时,创新资源的供给丰富,将为供应链提供有力支撑。我国科技创新优势不断增强,在高速铁路、高速计算机、量子通讯、5G网络、航空航天、深海探测等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还要看到,我国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为下一个阶段的供应链智能化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基础市场环境,这同样将吸引全球创新企业加速集聚,推动我国从生产制造基地向全球供应链创新应用高地转变。

由广度拓展现优势转变为深度主导优势。受国际经贸格局调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供应链全球分散化布局,以此降低对单一国家和供应商的依赖。这将导致全球供应链链条长度逐步收缩,供应链格局将逐步趋于区域化、本地化,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供应链辐射全球市场的“广度”。但同时要看到,依托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和亚洲区域市场,我国在区域市场的拓展深度和主导影响力可能得到凸显。在更加聚焦于区域化、本地化的发展趋势下,全球供应链将进一步围绕全球主要

市场布局。一方面,中国市场庞大,对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具有巨大需求,产能远离中国则意味着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会增加;另一方面,亚洲市场十分活跃,而我国已经形成了与周边国家协同配合的供应链格局。顺应全球供应链分散化布局的大趋势,我国与亚洲国家间将建立起更紧密的供应链网络,并依托强大的供给能力和需求市场不断夯实区域内的深度主导优势。

由“国内制造基地”优势转变为“全球制造网络”优势。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主要基于本土优势。近年来,受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影响,我国“国内制造基地”的优势趋于弱化,但同时要看到,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步伐加快,海外供应链战略布局初步完善,我国供应链“内外协同”的竞争新优势正在形成。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共有2.7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分布在188个国家(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累计对外投资存量位列全球第三位。其中,制造业投资涉及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制造业领域主要门类,遍布全球70%的国家。这些海外企业与国内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关联,此次疫情期间,海外企业在保供给、保渠道、保市场等方面均有较好表现。这意味着我国供应链优势将随着制造能力向海外延伸而进一步增强,推动基于国内制造能力的供应链优势进一步拓展为基于全球制造网络的供应链优势。

### 不断巩固提升优势地位

面向未来,应坚持底线思维,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巩固提升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

一是厚植产业集群发展根基,增强供应链竞争力。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完善的制造业配套体系的优势,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对内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做优做强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提升供应链竞争力。具体来看,需加强规划引导,提升协作配套能力,根据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制定产业供应链强链规划,通过建链、补链、强

链,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纵向合作和相关产业链企业之间的横向互动,提升供应链协调能力和响应速度;完善制度环境,提升创新应用能力,顺应供应链创新发展趋势,积极完善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的制度设计,为供应链创新应用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继续深化开放,提升包容发展能力,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完善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培育更具开放性和包容度的供应链体系。

二是发挥数字经济竞争优势,培育供应链创新力。要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向智能制造转型,提升柔性生产能力,打造数字经济新高地;要突破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加快构建产学研融合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更加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降低产业链高端环节对外依存度;要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链,发挥在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进一步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商业应用,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集群,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

三是跟进跨国公司全球布局,提升供应链“黏着力”。在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供应链分散布局的情况下,国内上下游配套企业若能采取“跟进”策略布局全球市场,在积极“引进来”、保证国内制造业根基稳固的同时,通过制造、研发及营销等多领域的内外协同,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将能够增强我国供应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黏着力”。对此,要精准发力推动高水平“引进来”,提升供应链发展水平,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吸引更多跨国高技术产业、高技术环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到中国布局;要积极构建与跨国公司更紧密稳定的供应链关系,继续夯实已经形成的产业配套优势,鼓励企业跟随跨国公司到重点区域和国家布局,在细分领域做精做专;要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供应链布局,抓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内产业和海外产业之间的供应链联系,提升我国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要提升供应链全球布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建立更符合供应链全球布局及发展的“走出去”制度框架,实现内外联动发展。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 经济茶座

早在199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详细阐述了数字经济可能的发展趋势,提出在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发展将由原子加工过程转变为数字信息加工处理过程。进入21世纪,由于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中快速扩散和应用,数字经济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简称“大智移云网”)为代表的的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催生基于数据获取、存储及处理的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与此同时,继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之后,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可以说,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非常重要的经济形态。

当前,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因其具有培育经济新形态、构筑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作用,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十三五”以来,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从“跟跑”发展到“并跑”,在一些领域甚至实现了“领跑”,数字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企业广泛受益,人民普遍受惠。以“大智移云网”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在我国各行各业实现了创新应用,不仅大幅提高了行业效率效益,还重塑了生产方式、服务模式与组织形态,创造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

与此同时,与数字信息技术相关的产业的比重也显著提高,数字化正在成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具体来看,数字信息技术产业正在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消费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激发了数字消费的巨大潜力,产业互联网构建了互联互通的平台并助力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改造。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而且为产业数字化升级改造提供了强大动能。

需要看到,数字经济是在数字技术领域的产业革命与制度创新基础上逐步发展的,是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综合体现,其在支撑基础、技术特征、组织结构与产业组织等方面都展现出独特优势。特别是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大的抗击能力和发展韧性,并在维持消费、保障就业、稳定市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大智移云网”能有效推动科技抗疫,为企业顺利复工复产保驾护航;线上消费服务呈现大幅增长态势,有效对冲了疫情对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要求,我们还面临更好建设数字中国的目标任务。对此,需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与集成作用,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韧性与创新能。

一是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重点是尽快消除妨碍要素自由组合的堵点,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与供给,加快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数字化升级改造。要持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要积极引导企业逆势求变,迎难图新,加快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解决“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等一系列制约更好发展的现实问题;要大力推进区域数字化、行业数字化和企业数字化等方面的促进中心建设,引导建设数字化转型开源社区,加强平台、算法、服务商、专家、人才、金融等有利于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的建设,降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转型门槛和成本。

二是搭建网络化协同平台。大力支持核心企业尤其是具有产业链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搭建网络化协同平台,鼓励其带动上下游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链向更高层级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服务化;积极培育数字经济的领军企业,打造数字虚拟产业园和数字虚拟产业集群,突破传统物理边界限制,充分发挥企业间的协同增效效应;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大力支持建设数字供应链,推动企业间订单、产能、渠道等实现资源共享与有效协同。

三是引进和培养数字经济领域的高端人才。积极稳妥打造与数字经济产业链相匹配的人才链,坚持大力引进与自主培养相结合,坚持使用国际国内两种人才相结合。要聚焦数字经济需要的人才定位,加快构建完善层次分明的人才引进政策体系;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加快建设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机构,为全球顶尖人才的集聚搭建平台。要切实解决人才所关注的生活安居、子女入学、老人赡养医疗以及个税缴纳与返还等切身利益相关问题,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留学生政策,多措并举吸引国外高层次青年储备人才。

四是稳步推进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加快建立包括政府、平台企业、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服务机构以及中小微企业在内的联合推进机制,积极鼓励与推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深的程度上推广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努力消除数据孤岛,实现数据资源的互通共享;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实现数字产业化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提升对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服务供给能力,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释放数字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倍增作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 陈晓东

## 理论在线

# 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 周廷勇 杨波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决战脱贫攻坚的“集结号”,发出了决胜总攻的“冲锋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刻学习领会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凝心聚力,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目前看,脱贫攻坚度符合预期:贫困发生率降至0.6%,“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基本完成,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与此同时,我国贫困治理能力明显提升,中国减贫方案和减贫成就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但也要看到,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

巨,决不能松劲懈怠。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剩余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不但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而且巩固脱贫成果的难度也很大。目前,各级党委和政府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松劲懈怠、精力转移,最需要坚持的是工作重点不转移、投入力度不下降、干部精力不分散,要继续绷紧弦、加把劲,坚定不移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在作风上要绷紧弦。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冲刺阶段,越容易产生松懈懈怠的不良作风。有的地方或部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屡禁不止,“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游走式”脱贫仍有发生;个别地区“一发了之”“一股了之”“一分了之”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越是在收官阶段,越要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要逐一对照检查扶贫领域专项巡视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与责任清单,在真改实改改上下功夫;要动态排查未脱贫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困户“三类群体”,及时解决贫困家庭的实际困难。

在精力上要更聚焦。我国扶贫事业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国性”体制性带动,到以“县”为单位、以“村”为单位推动,再到2013年以来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贯穿着扶贫区域越来越聚焦、扶贫战略越来越精准、扶贫精力越来越集中的实践逻辑。当

前,由于战“贫”与战“疫”碰头,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交织,一些地方出现了工作重点转移、投入力度下降、干部精力分散等现象。对此,要高度重视,并且采取务实举措加以解决,让基层扶贫干部心无旁骛投入到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中去。要切实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户外出务工的影响,解决好疫情影响下出现的扶贫产品销售难、扶贫产业发展难、扶贫项目开工难和帮扶工作推进难等问题,让战“疫”步伐更稳,战“贫”力度更大;要坚持靶心不偏、焦点不散、标准不变,在全力完成剩余脱贫攻坚任务的同时,强化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及早对存在返贫风险的近200万人和存在致贫风险的近300万人实施针对性预防措施;要着力推动产业扶贫,紧紧围绕产业发展做文章,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重点培育特色产业,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带动贫困村发展支柱产业,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培育成乡村产业项目的组织者、推动者和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建立健全产业发展与贫困群众利益联结机制和长期增收机制,实现脱贫效果的可持续;要持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

(作者单位: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 多方发力提升审计监督效能

□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任务,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办法,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三是要加强对产业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检查,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提质增效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此,需采取有效管用的务实举措,不断提升审计监督的效能,将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提升审计监督效能,要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于审计监督工作的始终。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审计工作落实;要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切实提高实施监

督的能力和水平。

提升审计监督效能,要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的高效联动,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需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关注教育、就业、医疗、保障性住房等领域,加强对脱贫攻坚和民生专项的跟踪审计,关注扶贫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扶贫政策落实和扶贫任务完成的情况,推动保障和巩固脱贫成果。同时,还需按照积极财政政策的导向,确保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

提升审计监督效能,要逐步消除监督盲区,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要加大对党中央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力度,及时反映偏离宏观调控预期目标的倾向性问题,促进重大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要深入调查,检视问题,监督相关政策措施的执行,

从基本制度严起、从日常规范抓起;要强化各项法规制度的执行,重点整治对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

提升审计监督效能,要拓展审计的广度和深度,及时反映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强化预算公开透明和预算刚性约束,维护财经纪律;建立地方政府债务全面审计制度,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投资审计,促进提升公共投资绩效;通过地方金融业发展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揭示地方金融业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薄弱环节,更好防范风险、消除隐患。

此外,还要将审计监督同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贯通起来,形成合力,全面提升审计监督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

(执笔:陈炜煌 顾煌)

本版编辑 梁笑语